

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代。文獻記載東漢永平八年（65年）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為浮屠齋戒祭祀」（《後漢書》卷三二〈楚王英傳〉）。至東漢桓帝時（146-167年）更於濯龍宮中設華蓋，並祀老子、浮屠（《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引《東觀漢紀》）¹日本藤井有隣館所藏推測為三世紀末期的著名金銅菩薩立像，²雖是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遺例，然而在已發現的漢代遺物當中，究竟有多少可確定為佛教圖像者，卻始終眾說紛紜。截至目前，為一般所接受的東漢時期佛像遺物有：四川省樂山城郊東漢大型崖墓後室門額所飾淺浮雕坐佛，³以及同省樂山柿子灣另一東漢崖墓後室門額所刻飾的兩尊坐佛。⁴兩者造型相似，頭帶項光，結跏趺坐，手似做「施無畏印」。其次，四川省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錢樹陶座，座下部有雙龍啣珠圖像，上端塑三人像，中間一像結跏趺坐，有肉髻，著通身袈裟，衣褶分明，⁵是目前中國所發現的最早的三尊像。⁶

此外，有的研究者還主張內蒙和林格爾漢壁畫墓中，西側一幅「仙人騎白象」表現的是降身故事；山東省沂南畫像石墓中南、北兩面帶項光的立像為佛像；山東滕縣出土的一件刻有兩隻六牙象的東漢畫像石殘塊為佛教圖像；新疆民豐縣尼雅墓中出土的藍色臘纈棉布上的菩薩像為東漢時期遺物；⁷江蘇省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一部份屬東漢佛教造像。⁸其次，新疆喀什噶爾三仙洞殘存

1 塚本善隆，《中國佛教通史》塚本善隆著作集1（春秋社，1979），頁61、67-68。

2 藤井有隣館學藝部編輯集，《有隣館精華》（二版，1977），彩圖二。包括上述圖錄在內，該佛像一般被認為是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前期的作品，但松原三郎氏則進一步推定該作品的年代在三世紀末期（松原三郎編，《改訂東洋美術全史》（東京美術，1981），頁164）。

3 李復華、陶鳴寬，〈東漢崖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6期，頁88圖右上、右下。

4 閻宵，《四川漢代畫像選集》（聯群出版社，1955），圖59的說明。轉引自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文物》1980年5期，頁77。

5 該陶座圖版參見曾昭燏等，《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頁66插圖42。較清楚的圖片可參見《中國の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講談社，1982），圖77。

6 應該指出的是，俞偉超（同註4，頁75）一文中，錯誤地將該三尊像陶座解釋做「中為釋迦像，兩側為大勢至菩薩和觀世音菩薩像」。

7 參見俞偉超，同註4，頁68-77。

8 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調查報告〉，《文物》1981年7期，頁1-7。俞偉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7期，頁8-15。步連生，〈孔望山東漢摩崖佛教造像初辨〉，《文物》1982年9期，頁61-65。閻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題材〉，《文物》1981年7期，頁16-19；及同氏，〈再論連雲港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題材〉，《考古與文物》1981年4期，頁111-114轉68。

的第一層壁畫有天象圖與大小佛菩薩等，其題材不僅可能是釋迦降身的故事，其人物形態也與和田縣瑪力克阿瓦提佛寺遺址中出土的東漢初期泥塑小佛像十分類似。⁹上述遺物有些還極待商榷，如沂南畫像石墓和連雲港孔望摩崖造像，前者的立像是否即為佛像？¹⁰後者的時代是否可上溯到漢代？其題材是否確屬佛教？¹¹學術界還存在著較多的爭論。但是從四川省東漢崖墓所見諸遺物看來，中國至遲在三世紀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佛像，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文獻記載中國佛教到了西晉時期已經是「寺廟圖像，崇於京邑」（《出三藏記集》卷一三）。¹²目前經正式發表的南方地區可確定為三國兩晉的佛像遺留有：湖北省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262年）墓出土的鍍金銅具上所飾佛像，¹³江蘇省鎮江市跑馬山一號墓出的金佛像牌，¹⁴和三國吳境內發現的所謂「佛像夔鳳鏡」、「畫文帶佛獸鏡」，¹⁵以及以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所飾佛圖像。然而儘管後者的數量較多，其中有的還是出自紀年墓葬，或是器物本身就帶有紀年銘文，有絕對年代可考，是探討南方佛像的流布情形等問題的有力線索，可惜就筆者所知直到目前似乎還不見有專文探討。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因此，本文即嘗試從陶瓷史的觀點，試著探討以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面所飾佛像的出現年代、分布、延續及其表現特徵和所包涵的意義。限於筆者對於佛教美術是個門外漢，只能就陶瓷史所見的幾個問題做粗淺的討論，沒有能力結合佛教史的發展做進一步有意義的闡釋。但文中所引陶瓷諸例，或可提供研究中國早期佛教史的一點資料性的參考。

進入討論之前，應該預先說明的是：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上裝飾有佛像的作品，以一種一般飾有複雜裝飾的罍形器的數量最多。這類罍形器可分為上下二層裝置，由於上部多堆塑人物、飛鳥、百獸、樓閣，因此有「堆貼人物閣樓罍」、「飛鳥人物罐」、「飾壺」等稱呼。而多數這類作品，還於

9 李遇春，〈新疆三仙洞的開窟時代和壁畫內容初探〉，《文物》1982年4期，頁13-17。

10 關於沂南畫像石墓中室擎天柱南、北兩面頭帶項光的立像，原報告（曾昭燏等，同註5，頁66）認為項光雖是佛教影響下的產物，但上述二立像並非佛像，「而是著普通衣服的童子」。塚本善隆氏則稱他們是神仙般的佛像或佛像般的神仙（塚本善隆，同註1，頁159）。其次，小南一郎氏從其圖像配置加以考察，認為極有可能為佛教圖像（小南一郎，〈佛教中國傳播の一樣相——圖像配置からの考察〉，收入《展望アジアの考古學——樋口隆康教授退官紀念論集》（新潮社，1983），頁515-525）。另外，林巴奈夫氏則認為南面的立像或為火神祝融，北面的立像或為司掌刑殺、降雨、水利工程的水官玄冥（林巴奈夫，〈漢代鬼神の世界〉，《東方學報》京都46冊（1974），頁238-240）。

11 閻孝慈氏雖同意其題材為佛教造像，但認為這批造像的年代「大致可定為曹魏以後，元魏以前」（閻孝慈，〈論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年代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3期，頁66-67轉73）。另外，夏鼐氏（夏鼐著、小南一郎譯，〈中國文明的起源〉（日本放送協會，1984），頁50）和東山健吾、鎌田茂雄等研究者則對於其題材是否為佛教？其時代是否可上溯到漢代？提出懷疑（鎌田茂雄、東山健吾、金岡昭光（座談會），〈佛教の東漸をめぐって〉，《歷史公論》10卷8號（1984），頁16-17）。其次，阮榮春氏則又主張，孔望山上部崖部羣像的年代均在唐代前後，下部的臥像（即所謂的「涅槃像」）時代雖較早，但不會早過於隋代（阮榮春，〈孔望山佛教造像時代考辨〉，《考古》1985年1期，頁78-87）。

12 高觀如，〈中印佛教關係〉，收入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1（知識出版社，1980），頁163。

13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藍蔚），〈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4期，圖版柒之8。

14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鎮江東吳墓〉，《文物資料叢刊》8（1983），頁27圖20。

15 以佛像做為裝飾圖案的三國銅鏡，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長沙、浙江省武義等地都有發現。詳見王仲殊，〈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綜論〉，《考古》1984年5期，頁470。

器的上部做為上部器身的大罐口頸處環置四個壺形小罐，因此又有「五壺罇」等稱呼。另外，有的研究者則推測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徵的意義，而叫它做「神亭」、「魂瓶」、「魂亭」、「骨灰罇」、「宇宙壘」、「穀倉罐」、或逕呼為「陶壘」。¹⁶上述諸名稱，各有偏重，有的還明顯錯誤。在還未有更恰當的統一命名出現之前，本文暫且採用「穀倉罐」的稱呼，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徵意義將在下章詳述。

「穀倉罐」之外，在當時還存在一種不施其他裝飾，或僅施加少量貼飾的「五聯罐」（前者多見於南京一帶吳墓，但安徽省亦有出土；後者可見於福建省閩侯縣東晉墓）。「五聯罐」雖然早於漢代已經出現，有可能是「穀倉罐」的前身，¹⁷然而筆者不能同意長谷部樂爾等研究者所主張的「五聯罐」即「穀倉罐」的前身，¹⁸這一簡單的演變公式。考古發掘表明，兩者於三國兩晉時期是並存的兩個樣式；除了時代因素之外，應該還要考慮到地域風格。多數「穀倉罐」雖於罐身上部加飾四個壺形小罐，具有「五聯罐」的形式，但兩者最大的區別則在於「穀倉罐」整體造型均可分為上下二層裝置，裝飾也較為繁縟。它們之間的關係自然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探討；本文考慮到上述理由和敘述上的明確性，則將它們區分開來。另外，出土的穀倉罐以及其他裝飾有佛像的器皿類，其文獻出處均明記於附表一～表四；以下的論述，除非必要，不再重複註明。

16 這類作品命名極為分歧，馮先銘，〈記1964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文物》1965年2期，頁37；易家勝，〈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8（1983），頁7、11、13等稱「堆貼人物樓閣罇」或「人物堆塑罇」。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4期，頁98等稱「飛鳥人物罇」。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1955年南京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頁8；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6期，頁304；三上次男，〈《陶器講座》中國I·古代（雄山閣，1982），頁279-282等稱「魂瓶」、「魂亭」。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Second edition, Phardon, 1980), p. 65 稱「骨灰罇」。金重德，〈越州古窯研究〉考古叢書1（上海，1944），頁4稱「宇宙壘」。陳萬里，〈《瓷器與浙江》（1946），頁42；馮先銘，〈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文物》1973年7期，頁22等稱「穀倉罐」。岡崎卯一，〈紹興出土の二三の飾壺〉，《寶雲》33冊（1944），頁82-89稱「飾壺」。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倉聖明智大學刊本，1927）稱「陶壘」。張拯元，〈紹興出土古物調查記〉，《文瀾學報》3卷2期（1937），頁15，則將上面堆砌有亭臺人物又加飾有五只小罇的作品稱為「五壺罇」，另一方面又將僅於上面堆砌有亭臺樓閣的作品稱為「神亭」。目前日本方面的絕大多數研究者，即沿襲張氏「神亭」的叫法，但卻又將具有張氏所謂五壺罇形式的上部堆砌複雜裝飾的作品，一併歸入「神亭」的範疇。例子甚多，這裡就不一一指出了。

17 馮先銘，同上註（1973），頁22。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頁125、161。朱伯謙，〈越窯〉中國陶瓷全集4（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1），頁169。

18 長谷部樂爾氏認為南京附近出土的「五壺罇」（五聯罐）可能即「穀倉罐」的「原形」（長谷部樂爾，〈魏晉南北朝的陶磁〉，《世界陶瓷全集》10·中國古代（小學館，1982），頁236）。易家勝氏更進一步推測「五聯罐」至孫吳五鳳年間（254-255年）以後就已消失，「代之而起的很可能就是陶瓷人物堆塑罇（筆者按：即穀倉罐）」（易家勝，同註16，頁13）。筆者雖然同意三國兩晉的穀倉罐有可能由東漢時期的五聯罐發展而來的看法；如浙江省奉化東漢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的器身貼飾人物、鳥獸的青瓷五聯罐，可能即為穀倉罐的前身（奉化縣文化館（王利華）、寧波市文管會（林士民），〈奉化白杜漢熹平四年墓清理簡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頁207-211）。然而南京梅家山出土的素陶五聯罐（屠思華、李鑑昭，〈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記略〉，《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4期，頁17圖17）從伴隨出土的的青瓷雞頭罐、虎頭罐等作品看來，筆者認為該墓很難早過孫吳晚期，而有較大可能為西晉時期墓葬。另外，福建福州附近也出土了僅飾少量人物貼塑的青瓷五聯罐（曾凡，〈南福鐵路工程中福州附近的考古發現〉，《考古通訊》1958年1期，頁60圖4）。該作品被認為是東晉時期產物（曾凡等，〈福建陶磁〉中國陶瓷全集27（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3），圖29）。上述例子表明了，穀倉罐出現之後，五聯罐仍然持續燒造。後者的數量雖較少，但兩者於三國、兩晉時期實為並存的兩個樣式。

壹、穀倉罐所見佛像

一、穀倉罐的時代及其分佈

考古文物工作者對於穀倉罐的燒造年代，並未取得一致的見解。總括起來，有下列幾種不同的看法。(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常見的作品。¹⁹(二)燒造於吳永安三年(260年)至西晉元康元年(300年)四十年間。²⁰(三)流行於吳永安三年(260年)至東晉永昌元年(322年)八十年間。²¹(四)最早見於吳永安三年(260年)，最晚的則遲至西晉永寧二年(302年)。²²(五)最早的為吳永安三年(260年)，最晚的是西晉永興元年(304年)；但從部分造型略呈僵化的作品推測，穀倉罐可能持續到東晉時期還有製造。²³(六)出現於孫吳晚期，延續到西晉末年。²⁴(七)東漢永康二年(168年)已經出現。²⁵(八)孫吳赤烏之後(238-250年)已經出現。²⁶以下筆者根據歷年來出土的紀年穀倉罐(包括紀年墓出土的作品和穀倉罐本身就刻有紀年銘文的作品)，試著檢討上述各家的說法。

總結上述各種見解，儘管研究者對於穀倉罐的下限意見分歧，然而多數研究者對於穀倉罐出現孫吳晚期的看法相當一致。另一方面，鄧白氏根據杭州出土的一件穀倉罐與「永康二年曹氏造作」墓磚伴隨出土，從而將這件青瓷穀倉罐的時代提前到東漢永康二年(168年)，則是明顯的錯誤。按該作品的出土情形，最早見於發現者陳萬里氏的著述。陳氏於《瓷器與浙江》一書先稱該作品係出自「晉代古壙」，²⁷後又於《中國青瓷史略》修正前說，認為是「東漢時代的原始青瓷」。²⁸從圖版觀察，²⁹其造型風格均與浙江省寧波慈溪西晉太康元年墓(280年)，³⁰或江蘇省吳縣楓橋獅子山西晉元

19 羅宗真，同註16，頁98。

20 馮先銘，同註16(1965)，頁37。

21 馮先銘，同註16(1973)，頁32。

22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肖夢龍)，〈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頁63。另外，三上次男，同註16，頁282也引用了這個看法。

23 長谷部樂爾，同註18，頁236。

24 易家勝，同註16，頁13。

25 鄧白，〈略談我國古代陶瓷的裝飾藝術〉，《硅酸鹽學報》6卷4期(1978)，頁295。又見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頁216。

26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17，頁170-171。

27 陳萬里，同註16，頁40。

28 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上海，1956)，頁3。

29 該作品的圖片參見小山富士夫，〈古越磁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8中國上代篇(河出書房，1955)，頁228插圖180。

30 林華東、展汝，〈寧波慈溪發現西晉紀年墓〉，《文物》1980年10期，頁93圖6。

康五年墓（295 年）出土的穀倉罐上部十分類似。³¹日本也藏有一件類似的作品。³²因此，「永康」應係西晉惠帝的年號，永康二年當為西元 301 年。

截至目前，出土的紀年穀倉罐（參見表一、表二）時代最早的要屬浙江省紹興出土的帶有吳永安三年（260 年）刻銘的青釉穀倉罐（圖 1）。其次，屬於孫吳時期的紀年穀倉罐，還有江蘇省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皇二年墓（273 年），江蘇省南京江寧縣上坊公社天冊元年墓（275 年），以及江蘇省金壇縣白塔公社天璽元年墓（276 年）。非紀年墓但推測為孫吳時期的幾座墓葬，也出土有穀倉罐。特別是南京江寧縣殷巷公社吳墓（圖 2）以及甘家巷高場一號墓出土的穀倉罐（圖 3），兩者在造型、裝飾特徵上有許多類似之處。前者的時代推測可能在 254-275 年之間；³³後者有的研究者根據伴隨出土的陶器，而主張其年代可能在赤烏年間（238-250 年）之後。³⁴從浙江省紹興出土的永安三年（260 年）紀年穀倉罐所呈現出來的極為成熟的技法，以及各地吳墓出土的穀倉罐之間所表現的類似風格看來，穀倉罐於孫吳晚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流行，有的可能在三世紀的五十年代已經開始生產。

兩晉時期的紀年穀倉罐數量更多。計江蘇省七件（其中吳縣楓橋林場獅子山一號墓出土兩件），浙江省十件。而絕大多數為西晉時期的墓葬，屬於東晉的，僅見有浙江省杭州三台山永昌元年墓（322 年）和蕭山縣永昌元年墓（322 年）等兩處。後者蕭山縣出土的作品，由於造型和裝飾風格均與紹興出土的吳永安三年紀年穀倉罐極為類似（圖 4），因此有的研究者將其年代訂定為孫吳時期。³⁵

從表一、表二所列紀年穀倉罐的出土實例看來，最晚的作品可見於浙江省三台山東晉永昌元年墓（322 年），反駁了部份研究者把穀倉罐的下限定為西晉，或將其下限延續到南北朝的看法。三台山永昌元年墓雖然未有正式發掘報告公諸於世，僅見於馮先銘氏 1973 年論文中的引述，但是考慮到蕭山縣東晉墓也出土有穀倉罐；以及長谷部樂爾氏所指出的，部份作品造型較為僵化等現象，穀倉罐延續到東晉初期還有製作是完全可能的。以越窯青瓷為主的穀倉罐，到了南朝已經絕跡，這與越窯在南朝已不再流行燒造明器的傾向吻合。

考古發掘報告還表明，穀倉罐流行於江蘇、浙江兩個省份（參見表一、表二）；其次安徽省、江西省亦有少量出土（參見表三）。此外，本世紀五十年代湖南省桂陽北門外第一中學原校址內，曾出

31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3（1980），圖版拾伍之 3。

32 參見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國明器泥象》（1954），圖 36，及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六朝の美術》中國美術展シリーズ 2（複製補訂版，1980），圖 1 之 74。前者將之定為三國時期越州窯系作品；後者則將之定為南朝時期作品。

33 易家勝，同註 16，頁 12。

34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 17，頁 170-171。

35 朱伯謙，同註 17，圖版 96 的說明。

土兩件「陶壘罍」，形制花紋複雜特殊，「上面似有許多佛像及鳥等」。³⁶可惜簡報中未揭載圖版，也未涉及作品時代，詳情不得而知。

穀倉罐的胎質，以青瓷佔絕大多數。但間有黑釉、黑褐釉或紅陶加彩（參見表一～三）。以紀年穀倉罐而言，時代最早和最晚的作品均出於浙江省，即以浙江省的流行時限最長。而觀察吳至西晉的青瓷穀倉罐，造型不見有顯著的變化。部份西晉時期的青瓷穀倉罐，如浙江省平陽縣鰲江元康元年墓（291年）（圖5）或江蘇省吳縣獅子山元康二年墓（292年）（圖6）出土的作品，下部壘均略趨瘦長，而以前者為甚。但詳細的編年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二、穀倉罐所見佛像裝飾

依據筆者的初步統計，見諸報導的加飾有佛像的穀倉罐至少有十六件。其中江蘇省出土九件，浙江省出土六件，另一件現藏於日本的作品出土地點不明。這個不完全的統計，還不包括若干光是據圖版無法確認是否裝飾有佛像的數例，但也清楚地表明了飾有佛像的穀倉罐，佔著極為突出的比率（參見表一～三）。

觀察穀倉罐所飾佛像，不外有下列三種裝飾技法。（一）將模印成型的佛像，貼飾於壘形器身的肩腹處。（二）將模印成型的佛像，貼塑於壘形器身上方所置樓闕近處或罐口附近。（三）於下部壘形器身肩腹處和上部近樓闕位置，均飾有模印佛像。第一種技法最為常見，所飾佛像數量不一，一般為一～三尊（圖7）。但如江蘇省金壇縣唐王公社吳墓所出作品，加飾的佛像達七尊之多（圖8）。第二種裝飾技法，如浙江省平陽縣西晉元康元年（291年）帶碑文的青釉穀倉罐，於上部所置樓闕下方，敞口罐口緣上下，飾有坐佛數尊，裝飾部位不甚明顯（同圖5）。反觀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吳墓所出黑褐釉穀倉罐，壘形器身上置三層貼塑，最上一層方形屋宇之下，屋壁四面各置一佛，又有七尊坐佛圍繞方屋四周，且均置於與瓶口相連的盤座之上。在瓶頸正面開一門，中置一佛，門前兩旁置雙闕，闕旁各有一小罐，後部對應處亦有二小罐，除正面外，四小罐間共飾佛像八尊（同圖3）。後者裝飾有多數佛像的穀倉罐，風格較特殊，與一般常見的穀倉罐不同，但與日本所藏青瓷穀倉罐（圖9）或江蘇省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墓（295年）（圖10）以及江寧縣殷巷吳墓出土的紅陶加彩穀倉罐有共通之處。特別是和殷巷吳墓的作品更為接近。殷巷吳墓的紅陶穀倉罐上部，除上層屋宇之外，下面還可分二層，下層近下部壘形器身口緣處飾七尊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同圖2）。第三

36 高至喜報導，〈湖南桂陽縣城外發現古代銅器及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7期，頁163。

種裝飾技法亦較罕見，可以江蘇省江寧縣上坊天冊元年墓（275年）所出青瓷穀倉罐為例。該穀倉罐裝飾繁縟，既於下部罐形身部交錯貼飾二層紋樣，坐佛夾雜於飛羊、鋪首、麒麟之間，又於上部堆塑坐佛數尊（圖11）。

以裝飾手法而言，穀倉罐所飾佛像數量不一，但多者常為七尊一組。其裝飾位置，罐形身部所飾佛像多見於肩腹處；至於裝飾在上部樓閣近處者，所在位置亦多相似。此外，穀倉罐所見佛像，一律是坐姿，手結定印，披通肩大衣，半圓形的衣紋一般較稀疏，居中下垂。大多數佛像都有明顯的肉髻和項光，趺坐於蓮花座上。江蘇省金壇縣唐王公社吳墓青瓷穀倉罐所飾坐佛，還可清楚見到坐佛兩側的一對獅子（圖12）。佛像均為模製；多數穀倉罐所飾佛像造型極為接近。這一方面說明了部分穀倉罐可能來自同一地區的窯場；也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於佛教這一新興的宗教，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共通的認識。但上述佛像卻又與鳥、龜、羊、熊等禽獸或鳳凰、麒麟、仙人騎獸等靈異羈雜並置，反映出中國早期佛教是結合在本國的傳統信仰之中。這還可以從湖北省鄂城寒溪公路出土的一件三世紀中期的吳鏡，³⁷既裝飾有佛像，又裝飾有東王公、西王母等中國傳統神仙像一事不難想像得到。

三、穀倉罐的產地和用途

穀倉罐有什麼作用？它的產地在那裡？這不僅涉及陶瓷史上的問題，也是探討佛教在當時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傳布的重要線索。目前所見飾有佛像的穀倉罐，其胎質有青瓷、黑褐釉及紅陶三種。後者有的還施加彩繪，而以青瓷佔絕大多數。南京江寧縣殷巷吳墓所出者為紅陶加彩，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墓則出土了黑褐釉穀倉罐。兩者的下部罐身均較肥矮，上方貼塑所飾坐佛圍繞盤形口緣一周，裝飾風格和造型特徵有共通之處，有可能來自同一地區。從穀倉罐的分布及裝飾風格看來，它們無疑是來自江南地區的窯場，而以南京鄰近地區的窯場可能性最大。

另一方面，早於數十年前研究者就曾對青瓷穀倉罐的產地做了概括的推測。如羅振玉氏在《古明器圖錄》一書中就將他得自劉體智的穀倉罐定為「吳會稽陶器」。³⁸大村西崖、³⁹金重德⁴⁰兩氏也認

37 王仲殊，〈關於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1982年6期，頁634。

38 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在這裡筆者係依據《羅雪堂先生文集》續編六（臺北重刊本），頁2483。前揭倉聖明智大學的刊本（同註16）中無「吳會稽陶器」題字。另外，同氏《金泥石屑》（文華出版公司印行），頁532《羅雪堂先生文集》續編冊十三的原目錄中則記為「吳始寧陶器」。

39 大村西崖著、陳彬辭譯，《中國美術史》（臺灣商務印書館版，1967），頁34-35。

40 金重德，《越州古窯研究》考古叢書1（上海，1944），頁4

為羅振玉所藏的穀倉罐是越窯作品，小山富士夫氏更進一步地主張上述穀倉罐係來自浙江省的九巖窯。⁴¹其次，陳萬里氏也曾推測浙江省杭州出土的吳永安三年（260年）紀年穀倉罐是早期越窯作品；⁴²George Eumorfopoulos 氏所藏的一件青釉穀倉罐，也被認為是浙江省九巖窯的作品。⁴³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更提供了探討青瓷穀倉罐的重要線索。這不僅可將穀倉罐的胎質、青釉的呈色以及伴隨出土的陶瓷，比照近年來瓷窯出土品得到印證；部份青瓷穀倉罐所飾龜趺碑文更是直截地透露了穀倉罐的產地。如「元康四年九月九日〔造〕□州會稽」（浙江省餘姚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造〕會稽上虞」（浙江省平陽縣出土）；「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起會稽」（江蘇省吳縣出土）；「出始窰，用此□」（江蘇省吳縣出土）等碑銘（參見表一、表二），均明白地指出其主要產地在「會稽上虞」或「始寧」（今浙江省上虞縣南），屬越窯作品。其次，考古發掘還表明，除越窯之外，浙江省甌窯（浙南溫州一帶）和婺州窯（浙江省中部金華地區）亦有少量生產。如浙江省武義廠三國墓出土的青釉穀倉罐（圖 13）或金華地區古方第十二號三國墓、第二五號西晉墓出土的青釉穀倉罐，胎質與婺州窯窯址的標本一致，屬婺州窯作品。⁴⁴它們顯然是受到越窯的影響。⁴⁵

最早明確地指出穀倉罐用途的是張拯亢氏。張氏於本世紀三十年代調查紹興出土的古墓葬隨葬品時，依其造型裝飾將穀倉罐區分為「神亭」和「五壺罇」兩類。前者指上部「堆砌樓臺」、「瓶肩浮彫武士」的作品；後者指口上「堆砌小罇五」，罇上飾有人物、禽獸，又有的「上堆牌樓碑亭人物鳥獸」。而「神亭」所飾亭臺是取「神所馮依之意」；「五壺罇」上所堆飾的牌樓碑亭人物鳥獸是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⁴⁶其後研究者在敘及穀倉罐性質時，有的認為是香爐、⁴⁷薰籠之類；⁴⁸有的推測是具有宗教用途；⁴⁹有的認為是祭器；⁵⁰也有的認為是骨灰罇；⁵¹而

41 Fujio Koyama, "The Yüeh-Chou yao Celadon Excavated in Japan", *Artibus Asiae*, Vol. 14 (1951), p. 32, fig. 5. 又小山氏於上文中並未言明該穀倉罐係羅振玉所有，筆者是根據羅氏《古明器圖錄》所載圖版確認。

42 陳萬里，同註 16，頁 42。

43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s, *Illustrated Catalogue* (Sotheby & Co. 1941), p. 21.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之遺物と其の遺跡〉，收入《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41），頁 1131。

44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9期，頁 816-825。以及貢昌，〈談婺州窯〉，收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頁 22-31。但值得注意的是，「談婺州窯」一文所載出土於浙江省蘭溪永昌的穀倉罐（頁 24 圖 2 之 2）與發掘報告書所載金華古方第十二號墓出土的作品完全一致（圖版伍之 5、6），應為同伴器物。因此蘭溪永昌是否出土有婺州窯穀倉罐，值得懷疑。本文暫不列入計算。

45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 17，頁 161。

46 張拯亢，同註 16，頁 15。

47 岡崎卯一，同註 16，頁 86-87。岡崎氏誤釋羅振玉所藏穀倉罐之「會稽出始寧」碑銘的「窰」（寧）字為「盧」，因此認為穀倉罐是香爐。

48 引自南京博物院編輯，《南京附近考古報告》南京博物院集刊之一（上海出版公司印行，1952），頁 7。

49 長谷部樂爾，〈褐釉裝飾壺とその周邊〉，《大和文華》54（1971），頁 21。

50 佐藤雅彥，《中國陶磁史》（平凡社，1978），頁 72。

51 Margaret Medley，同註 16，頁 65。

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則主張是殉葬用的明器。穀倉罐是否還具有宗教上的所謂祭器的性質？目前還難遽下斷言；然而三國兩晉時期的香爐或薰籠已由考古發掘所得到的眾多遺物予以證實，它和穀倉罐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其次，考慮到當時的喪葬習俗，或出土有穀倉罐的墓葬構築，以及有的墓葬還伴隨出土有腐朽的人骨等情形看來，⁵²它不會是骨灰罐。這還可以從部份穀倉罐於罐形身部鑄鑿有孔，不適於裝盛骨灰的情形得到旁證。

筆者同意穀倉罐是明器的看法。這不僅可以從穀倉罐的裝飾題材得到說明，部份穀倉罐上方龜趺所刻飾的銘文更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以裝飾題材而言，南京鄧府山一號墓出土的穀倉罐上方樓閣之間，小門之外，放置有一棺材，棺材兩側，兩孝子相對跪伏，五體及地，充分地表現出喪葬時的悲哀場面（圖 14）。以碑文內容而言，羅振玉所藏一器碑文為「會稽出始窰（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衆無極」，這裡更是明白地指出穀倉罐是喪葬的用器。類似內容的穀倉罐碑文還有「永安三年時，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億）萬歲未見英（央）」；或「元康出始窰，用此甕，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等。⁵³其書文內容與常見的漢代明器鎮墓瓶（朱書陶瓶）的部份詞句很接近；如漢初平四年（193 年）王氏朱書陶瓶即有「今後曾財益口，無有央咎」書文。⁵⁴此外也有書「子孫富貴豪強，賞財千億，子孫番息」等文字的鎮墓陶瓶。⁵⁵穀倉罐是否還兼有安撫亡魂勿為崇生人的鎮魂用途，目前還難遽下斷言，但一般所飾繁縟裝飾的表現內容，無疑就是象徵人生富貴、多子多孫、五穀豐登、百獸率舞或喪葬禮儀的熱鬧場面。張拯亢氏所形容的：「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可說是對於穀倉罐功能的貼切描述。因此，無論是碑文內容還是裝飾特徵，都說明穀倉罐是做為喪葬用的明器。將佛像裝飾於明器穀倉罐，再度說明了當時佛教是結合在傳統的民間信仰之中。

52 如 1953 年發掘江蘇省宜興周墓墩二號墓時，既出土有青瓷穀倉罐，同時於墓室擾土中發現有人牙及人骨（參見羅宗真，同註 16，頁 92）。

53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 31，頁 136）認為吳縣獅子山三號墓所出穀倉罐碑文「用此」之下一字可能做「甕」，而「甕」亦做「鑿」，瓦器也。上述釋文也被引用於近年來出版的《中國陶瓷史》一書中（同註 17，頁 140）。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可能涉及「穀倉罐」在當時的真正稱呼。但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

54 唐金裕，〈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文物》1980 年 1 期，頁 95。

55 中村不折，《禹城墨寶書法源流考》（1927），頁 8。

貳、其他以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所見佛像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英國的布蘭克史東氏（A. D. Brankston）於〈九巖越州窯〉一文中，首先揭載了幾尊越窯小型坐佛（圖 15）以及一件器身貼飾有佛像的青瓷豆（圖 16）。五〇年代，蔣玄侒等著《中國瓷器的發明》一書中也收錄了一件黃青釉小型坐佛（圖 17）；其造型特徵與布蘭克史東氏揭示的坐佛十分類似。上述小型坐佛有項光或背光，趺坐於蓮花座上；有的明顯於身部兩側置一對獅子，佛的造型特徵表現得十分清楚。目前雖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證明這幾尊小型坐佛到底是獨立的佛像？還是青瓷器皿類的附屬配件？但至少可以確定越窯除生產有貼飾佛像的穀倉罐，還燒造有裝飾佛像的其他青瓷器皿。

三十年來，雖然不見有三國兩晉時期青瓷小坐佛出土的正式報導，但江蘇省南京趙士崗墓吳鳳皇二年墓（273 年）曾出土過幾尊報告者稱為「人像」的小型坐像。⁵⁶上述「人像」均係紅陶胎，薄施淡茶黃釉。從圖片觀察，似不見有明顯的項光或肉髻，然均結跏趺坐，身披通肩大衣，衣紋稀疏，居中下垂，底置蓮花座。「人像」兩側似還飾有一對異獸（獅？）（圖 18）。值得注意的是，該墓還出土了貼飾佛像的黃釉穀倉罐（圖 19），而「人像」的造型特徵即與穀倉罐所飾坐佛如出一轍，並且與 1972 年江蘇省鎮江市唐王公社等吳墓出土的穀倉罐所飾坐佛造型極為相近（同圖 12）。因此這幾件「人像」應該就是有確切年代可考的珍貴的早期佛像資料。

考古發掘表明三國吳、西晉時期生產有不少額上裝飾類似模仿釋迦的「白毫相」陶瓷俑。如湖北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262 年）出土的青綠釉陶俑；⁵⁷湖南省長沙金盆嶺西晉永寧二年墓（302 年）出土的一批青瓷俑；⁵⁸以及南京光華門外黃家營吳或西晉墓出土的施薄黃釉的跪俑。⁵⁹上述陶瓷俑額上飾物是否確屬佛教的「白毫相」？學術界還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塚本善隆氏認為蓮溪寺的釉陶俑應是神仙般的佛像或是佛像般的神仙。⁶⁰中國方面的研究者也主張蓮溪寺、金盆嶺的陶瓷俑額上的飾物確屬「白毫相」，是佛教影響下的產物。⁶¹從蓮溪寺釉陶俑還伴隨出土有刻畫佛像的鑲金金銅

56 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南京六朝陶俑》（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圖 3。

57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藍蔚），同註 13，圖版柒之 3~5。

58 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 年 3 期，頁 86 圖 5 及圖版陸~拾貳等。

59 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同註 56，圖 4。

60 塚本善隆，同註 1，頁 159。

61 如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頁 317。及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 17，頁 146。

具看來，同墓陶俑額上所飾「白毫相」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

另一方面，見於中國方面著述的三國、西晉時期貼飾有佛像的青瓷器皿，除穀倉罐之外，至少有五件。它們分別是浙江省吳興西晉墓的青瓷雙耳罐（圖 20）、湖北省宜昌西晉墓的青瓷博山爐（圖 21）、湖北省鄂城六朝墓的青瓷洗、以及出土地點不明的青瓷奩（圖 22）和帶繫罐（圖 23）（參見表四）。⁶²五件作品中，除湖北省宜昌市的博山爐見於正式的發掘報告書，其餘均僅見於研究者的間接引述。其次，《中國陶瓷史》一書亦提及三國、兩晉的瓷器，如「穀倉罐和碗、鉢等器物出現了佛造像和忍冬紋的裝飾」，⁶³可惜詳情不得而知。此外，日本的私人藏品也見有裝飾佛像的西晉時期越窯青瓷奩。⁶⁴這些片段不完全的資料，卻也清楚地反映出佛像是以三國、西晉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的裝飾題材之一。

從裝飾風格觀察，加飾佛像的青瓷器皿，除湖北省宜昌市的作品為博山爐，佛像飾於托口與爐身相接處，似做為撐托的支足之外；其餘作品（包括布蘭克史東氏揭示的青瓷豆和東山健吾氏收藏的青瓷奩）佛像一律貼飾於器物的肩部或腹部所飾網紋或斜方格紋裝飾帶之上。裝飾部位相當一致，具有典型的時代風格。過去由於缺乏可靠的地下材料，布蘭克史東氏曾將上述青瓷豆的年代定為五世紀的作品；⁶⁵近年來的出土資料則表明，網格紋裝飾帶出現於吳的晚期，流行於西晉，至東晉初年已經消失。⁶⁶其次，比較紀年墓出土的同類作品造型，可以認為上述作品均屬西晉時期。所飾佛像與穀倉罐裝飾的佛像極為類似，均呈坐姿，手結定印。著通肩大衣，有項光，且都是模印成型後再貼飾於器的肩腹部位。佛像一般為二～三尊；多數與中國傳統圖案交錯排列。如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佛像奩（同圖 22）或布蘭克史東氏介紹的青瓷豆（同圖 16），佛像均與鋪首啣環對稱並列。

小結

有關佛教初傳中國的種種傳說，中外的研究者已經有過許多的討論。《歷代三寶記》卷四說竺融

62 值得注意的是，宜昌市出土的博山爐的造型或裝飾技法，均與同省鄂城城西西山麓東吳孫將軍墓出土的博山式薰爐一致。後者薰盤三面外側各飾一尊報告書稱為「侏儒」的坐像（參見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年3期，頁166及167圖9之2，另圖版柒之3）；而該「侏儒」坐像的造型也與宜昌市出土的博山爐上所飾佛像極為類似，有可能即為佛像。但這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或清楚的圖片來證實。

63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17，頁158。

64 該作品是筆者的老師東山健吾教授的收藏。

65 A. D. Brankston, "Yüeh ware of the "Nine Rocks" Kiln", *Burlington Magazine*, (Dec. 1938), p. 260, Plate II. F.

66 朱伯謙，同註17，頁175。

「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又說「孝桓帝世又以金銀作佛形像」；⁶⁷將文獻記載比照出土文物，可以肯定中國至遲在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佛像。另一方面，江南地區早期佛教造像的實際情況，依然極為模糊。文獻上雖記載吳大帝孫權崇尚佛教，赤烏四年（241年，一說赤烏十年，247年）於南京建立起第一座大寺廟——初建寺（《出三藏記集》卷一三）；著名的康僧會也在三國吳都建業「設像行道」；吳孫皓的衛兵更在後宮園中見到「一立金像」（《出三藏記集》卷一三），後者被認為可能是釋迦像。⁶⁸然而遺物不存，詳情不得而知。從這點而言，以越窯為主的陶瓷器，或吳鏡等手工藝品所見佛像裝飾，無疑是理解南方佛教的重要線索之一。

過去，長谷部樂爾氏在論及六朝陶瓷時，指出飾有佛像的青瓷穀倉罐最早實例，見於江蘇省吳縣西晉元康五年墓（295年）出土的作品。⁶⁹事實上，早於孫吳鳳皇二年墓（273年）出土的穀倉罐已經飾有佛像（同圖19）。其次推測為孫吳時期的非紀年墓出土的加飾佛像穀倉罐，在江蘇浙江兩省分亦見有數例（表一、表二）。特別是江蘇省南京甘家巷高場出土的穀倉罐（同圖3），從伴隨出土的陶器看來，其年代可能在赤烏（238-250年）之後；因此，有的研究者主張該穀倉罐是中國南方地區現存最早的佛教藝術品。⁷⁰以紀年穀倉罐而言，如前所述，最早的作品為吳永安三年（260年，浙江省紹興出土）；最晚的作品則遲至東晉永昌元年（322年，浙江省杭州出土）。而裝飾有佛像的紀年穀倉罐最早的實例為吳鳳皇二年墓（273年，江蘇省南京出土），而晚至西晉元康元年墓（291年，浙江省平陽縣出土）還可見到。再結合其他裝飾有佛像的青瓷器皿的年代，可以得知，陶瓷器上裝飾佛像約流行於孫吳末期至西晉中期。以紀年作品而言，浙江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296年）磚墓出土的貼飾佛像青瓷雙耳罐（同圖20）是目前最晚的實例。其次，湖北省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262年）出土有刻飾佛像的銅具；而裝飾有佛像的所謂「佛像夔鳳鏡」、「佛獸鏡」等鏡式，據王仲殊氏的說法，它們當流行於三世紀中期。⁷¹這樣看來，早於三世紀中期，中國南方的佛教造像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普及。這與孫權末年康僧會立寺傳教，吳國「大法（佛教）遂興」（《高僧傳、康僧會傳》）等文獻記載一致。⁷²

從部份穀倉罐碑文所記「出始寧」、「會稽」等銘文得知，多數青瓷穀倉罐係來自浙江省的上虞、

67 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83。

68 水野清一，〈中國における佛像のはじまり〉，《佛教藝術》7（1950），收於《中國の佛教美術》（平凡社，1968），頁17-18。

69 長谷部樂爾，同註18，頁236。

70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17，頁170-171。

71 王仲殊，同註15，頁470。

72 引自任繼愈主編，同註67，頁186。

會稽一帶，屬越窯作品。相對的，如前所述南京江寧縣殷巷吳墓出土的紅陶加彩穀倉罐有可能燒造於南京鄰近地區的窯場。另一方面，目前所見出土於湖北省、湖南省、浙江省等省分的飾有佛像的三國鏡，亦均為吳鏡，不見有華北的魏鏡。⁷³吳鏡的鑄造地點主要有兩處，一是會稽郡的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一是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城）。山陰的工匠有時還到武昌鑄鏡，使武昌成為吳的鑄鏡中心。⁷⁴這些事實，不僅表明了佛像裝飾是孫吳、西晉時期南方手工藝作品經常採用的題材之一，其出土分布、生產地、也與吳的譯經曾經在武昌並盛行於建業一事吻合，而天竺沙門維祇難亦曾於黃武三年（224年）攜帶《法句經》梵文到武昌，由竺將炎和支謙二人譯成漢文。⁷⁵

文獻記載，東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至四年（161年）日南邊郡外等南海諸國入朝貢獻，因此除了經由西域傳入中國的東漢時期華北佛教之外，早於二世紀後半，南方佛教可能隨著與南方諸國通商而傳入交趾和廣東。⁷⁶特別是交趾、會稽為當時海上交通的據點，佛教還有可能經由海路傳入中國。⁷⁷浙江省會稽雖是裝飾有佛像的越窯青瓷和吳鏡的主要生產地之一，可惜目前還無足夠的證據可以證實上述手工藝品的佛教因素係來自南方的海上之道。

另一方面，自漢通西域以來，佛教雖以洛陽為中心，但已逐漸傳至丹陽、彭城、廣陵等江淮一帶；特別是靈帝末年，避難投奔江南者不在少數，連安世高也是為避「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高僧傳》〈安世高傳〉），足跡及廬山、廣州和會稽。⁷⁸大量的北人南徙，或許將佛教帶入淮河或長江流域。著名的笮融築寺鑄佛（《後漢書》卷七三〈陶謙傳〉及《三國志》吳志、卷四〈劉繇傳〉）以及楚王英的禮拜浮圖（佛）、黃老等傳說（《後漢書》卷三二〈楚王英傳〉），前者反映了東漢靈帝末年至獻帝時期彭城（徐州）的佛教情形；後者楚王英的轄地亦是以徐州為中心，治淮河南北一帶。⁷⁹其次發掘南京太平門外棲霞山甘家巷東吳 M29 號墓出土的建衡二年（270年）鉛地券，其券文有「處士徐州廣陵堂邑」等記載；⁸⁰而曹操恐江濱郡為孫權所掠，徵令內移，故「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三國志》吳志〈孫權傳〉）；並且青州、徐州、汝州、沛州等地人民亦大批歸附東吳，至於徐、泗、江、淮之地無人居者數百里（《三國志》吳志、〈孫韶傳〉）。⁸¹上述

73 王仲殊，同註 15，頁 470，及同註 37，頁 630-637。

74 徐莘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銅鏡〉，《考古》1984年6期，頁 558。

75 《中國佛教》第 1 輯，頁 12。

76 塚本善隆，同註 1，頁 143。

77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岩波全書 310（岩波書店，1979），頁 29。

78 任繼愈主編，同註 67，頁 166。

79 鎌田茂雄，同註 77，頁 24、28，及塚本善隆，同註 1，頁 73-74、頁 121-123。

80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羣〉，《考古》1976年5期，頁 32 及同頁圖九拓本。又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同註 16，頁 14 參照。

81 參見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同註 16，頁 14。

記載，反映了佛教開化較早的彭城、廣陵等地居民，已經逐漸移居江南；以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所飾佛像，或有可能是受到南下佛教的影響。

綜觀三國吳、西晉陶瓷器上所見佛像裝飾，佛像均與中國傳統民俗圖樣羈雜並列，交互布局。其中以穀倉罐的圖樣最為繁縟；包括有鋪首、麒麟、仙人騎獸、鳳凰、龜、鳥以及人物百獸等等。江蘇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墓（296年）出土的貼飾佛像的雙耳罐，其佛像所據位置在同時期同種器形的陶瓷器上一般都飾以鋪首啣環或異獸；⁸²從而得知，佛像在當時曾被做為一種辟邪或象徵吉祥的紋樣。其次，陶瓷器上所見佛像於器物整體的位置，均非高高居上莊嚴不可逼視，而僅是做為一種裝飾題材罷了。湖北省宜昌市出土的青瓷博山爐，佛像甚至被當做撐托的器足，說明了南方地區佛教雖已相當流行，然而顯然還缺乏後世那樣的崇敬。將佛像飾於祈保生人富貴多子的明器穀倉罐，不僅說明了當時中國接受佛教，已偏重其祈保福祿的現實利益，也與《牟子理惑論》所記載的東漢明帝營建其壽陵顯節陵時，其上做佛圖之像的傳說，以及後世石窟寺院或單獨佛像的造像題記經常與死者有關一事，不謀而合。⁸³楚王英並祀黃老（黃帝、老子）、浮屠（佛），桓帝共祀浮圖、老子等事，清楚地表明了當時的人們是將佛教與祈求長生不老，崇尚無為的黃老信仰等同並置。反映出中國佛教的特有基本性格，以及外來宗教為了在中國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與中國固有的思想、風俗信仰相互調和的一個側面。

東晉以後，佛教已在中國取得廣大的擁護和較為鞏固的地位，人們對於佛教的信仰更趨虔誠。東晉以後的陶瓷器上很少見到佛像裝飾，⁸⁴說明了佛像已不再被任意地做為裝飾圖案使用，代之而起的則是象徵佛、清淨的蓮花瓣紋加飾於陶瓷器上。⁸⁵蓮花瓣紋瓷器到了南朝更得到全面的發展。

82 Mary Tregear, *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 (Oxford, 1976), Pl. 25, 30.

83 關於佛教與葬送禮儀的結合，可參見小南一郎（同註10）的簡短論述。

84 這裡是指出土文物或傳世作品上所見到的一般裝飾傾向而言。例外的少數，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傳為河南省上蔡縣出土的南北朝時期青瓷蓮花尊，即於尊頸下部兩側各貼飾有兩軀帶有背光的交腳並坐佛像（參見楊文和、范世民，〈青瓷蓮花尊〉，《文物》1983年11期，頁86及圖版捌之2）。另外，1972年陝西省銅川黃堡鎮耀州窯址出土的唐代黑釉帶座罐（塔形罐），於座上也飾有幾尊佛像（參見李知宴、朱捷元，〈唐白釉貼花鉢白瓷吐盃和黑釉罐〉，《文物》1979年1期，圖版拾壹之3，及銅川市耀州窯博物館（盧建國），〈耀瓷裝飾藝術〉，《考古與文物》創刊號（1980），頁123-124和圖版拾之2）。

85 考古發掘表明，中國遠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就存在有蓮花（朱伯謙，同註17，頁177）。《詩經》上也有「山有扶蘇，隰有荷花」等描述蓮荷的記載（參見梁國寧編，《園藝史話》（農業出版社，1983），頁80）。著名的春秋時期「蓮鶴古壺」（《中國古青銅器選》（文物出版社，1976），圖56）或山西省侯馬戰國早期墓（編號58、H4、M6）出土的陶壺（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侯馬地區東周、兩漢、唐、元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59年6期，頁47）等作品均以蓮瓣做為器物裝飾。飾有蓮瓣紋的漢代陶瓷也有若干實例；如湖北省當陽縣東漢畫像石墓出土的肩部刻劃覆蓮瓣的醬褐釉四耳罐（沈宜陽，〈湖北當陽劉家冢子東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1977）），或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漢代「綠褐釉蓮瓣紋壺」（上海博物館所藏，《中國歷代陶磁展》（日本，1984-1985），圖13）。從南京象山東晉無名氏墓出土的青瓷蓮瓣四耳壺或貴州平壩馬場第三四號墓出土的東晉末至南朝的青瓷蓮瓣紋六耳壺（參見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昭和五十五年度，1980），頁110註47），以及浙江省蕭山縣上董窯址或寧波雲湖窯址發現的不少刻劃蓮瓣紋的標本看來（黨華，〈浙江蕭山縣上董越窯窯址發現記〉，《文物參

〔附記〕

(一) 脫稿後，根據新的報導，南京市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貼飾佛像的青瓷盤口小壺。該小壺係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鄧府山西晉墓，高六·七公分，肩部印弦紋及斜方格紋並且於兩耳之間貼飾坐佛各一尊，坐佛後有背光，下有蓮花座，因此穀倉罐之外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上加飾有佛像的作品又添加了一個實例。(報導參見李蔚然(南京市博物館)，〈試述南京地區六朝墓葬青瓷來源及其有關問題〉，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 1981》(文物出版社，1984)，頁 135-139)。

(二) 本文的完成承蒙成城大學東山健吾教授的指導，提供筆者不少寶貴的意見，特在此致以謝意。

(原載《故宮學術季刊》3 卷 1 期，1985)

考資料》1955 年 3 期，頁 70 圖五；林士民，〈浙江寧波雲湖窯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頁 9-14)。蓮瓣紋到了東晉後期隨著佛教的盛行，重新賦予蓮花新的意義而再度登場；但卻不能說中國的蓮花裝飾是起源於佛教。

○表示裝飾有佛像的穀倉罐

表一 江蘇省出土穀倉罐

編號	出土地	紀年(西元)	胎釉	佛像
1	江蘇省南京鄧府山 (DFM1)	(1)孫吳~東晉初 (2)漢末~六朝初	紅陶	不明
2	江蘇省宜興	晉	青釉	不明
3	江蘇省南京光華門外趙土崗	吳鳳皇二年 (273)	青釉	○
4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東山	(1)吳 (2)西晉	青釉	○
5	江蘇省南京甘家巷高場	吳	黑釉帶褐	○
6	江蘇省南京高家山二號墓	吳~東晉初	青釉	不明
7	江蘇省南京市郊板橋鎮	西晉永寧二年 (302)	青釉	不明
8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林陵公社	西晉太康四年 (283)	陶	不明
9	江蘇省句容縣石獅公社	西晉元康四年 (294)	青釉	不明
10	江蘇省淮陽	西晉	青釉	不明
11	江蘇省金壇縣白塔公社	吳天璽元年 (276)	青釉	不明
12	江蘇省金壇縣唐王公社	吳	青釉	○
13	江蘇省南京西崗	西晉	青釉	○
14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場獅子山一號墓	西晉元康五年 (295)	青釉	○
15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場獅子山二號墓	西晉元康二年 (292)	青釉	不明
16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場獅子山三號墓	西晉元康年間 (291-99)	青釉	不明
17	江蘇省吳縣獅子山四號墓	西晉	青釉	○
18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上坊公社	吳天冊元年 (275)	青釉	○
19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殷巷公社	吳晚期 (254~75)	紅陶加彩	○
20	江蘇省南京中華門外眼香廟	吳~西晉	陶	不明

表二 浙江省出土穀倉罐

編號	出土地	紀年(西元)	胎釉	佛像
1	浙江省杭州	西晉永康二年 (301)	青釉	不明
2	浙江省紹興	西晉太康三年 (282)	青釉	不明
3	浙江省紹興	吳~晉	褐釉	不明
4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5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6	浙江省諸暨	西晉永康元年 (300)	青釉	不明
7	浙江省平陽縣	西晉元康元年 (291)	青釉	○
8	浙江省慈溪	西晉太康元年 (280)	青釉	不明
9	浙江省上虞	西晉	青釉	不明
10	浙江省金華地區武義縣	三國晚期	青釉	○
11	浙江省衢州	三國	青釉	○
12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13	浙江省紹興	吳永安三年 (260)	青釉	不明
14	浙江龍山	吳	青釉	○
15	浙江省蕭山縣	吳	青釉	○
16	浙江省平陽縣	西晉元康三年 (293)	不明	不明
17	浙江省餘姚	西晉元康四年 (294)	青釉	不明
18	浙江省杭州	東晉永昌元年 (322)	青釉	不明
19	浙江省金華 (M12)	三國	青釉	不明
20	浙江省金華 (M25)	西晉	青釉	不明
21	浙江省金華 (M30)	西晉太康二年 (281)	青釉	○

編號	(佛像)裝飾部位	出土年	備註
1		1951	據發掘報告書第7頁，稱出土有穀倉的一號墓的時代「早可至孫權時，遲可至東晉初年」。但第8頁則又稱鄧府山一、二號墓的時代為「漢末或六朝初」。
2		1952 發現 1953 發掘	
3	下部罐身	1955	同南京江寧趙史崗七號墓，鳳皇二年鉛地券。
4	下部罐身	1957	據《南京博物院展》(1981)的說明為「東吳」的作品 另外《江蘇六朝青瓷》(1980)則認為是「西晉」時期的作品。
5	下部罐身及上部貼塑	1958~	
6		1961~62	
7		1964	「永寧二年……」鉛地券
8		1965	報告書記太康四年為西元284年，應為283年之誤。 「太康三年……」墓磚
9		1966	「元康四年」墓磚
10		1972	
11		1973	「天璽元年……」墓磚
12	下部罐身	1973	
13	下部罐身	1974	
14	上部堆塑	1976	共出土二件，其中一件裝飾佛像。
15		1976	龜趺刻「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起會稽」銘文
16		1976	龜趺牌額刻「元康」，以下三行刻「出始窰，用此□」「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
17	下部罐身	1979	龜趺刻「會稽，出始窰……宜子……」
18	下部罐身及上部貼塑	1979	「天冊元年……」墓磚
19	上部貼塑	1979	
20		不明	

編號	(佛像)裝飾部位	出土年	備註
1		1935	「永康二年曹氏造作」磚
2		1936~37	「太康三年作」磚
3		1936~37	
4		1936~37	
5		1943	上部殘器三件，上部貼飾殘件四件(小形屋二，龍頭二)。
6		1956	「永康元年太歲在庚申作」磚等
7	上部堆塑處	1966	「元康元年八月二日〔造〕會稽上虞」銘文
8		1977	
9		1978	
10	上部堆塑處	1979	
11	下部罐身	1980	伴隨出土有「建安廿四年」銘神獸鏡
12		不明	
13		1937	「永安三年時，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萬歲未見英」銘文
14	下部罐身	1911?	「會稽出始窰，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銘」銘文
15	下部罐身	不明	東晉永昌元年(322)磚墓出土
16		不明	
17		不明	「元康四年九月九日〔造〕口州會稽」銘
18		不明	
19		不明	
20		不明	
21	上部堆塑?	不明	「太康二年」磚

表三 其他省分出土或出土地點不明的穀倉罐

編號	出土地	紀年（西元）	胎釉	佛像
1	安徽省蕪湖赭山 (M108)	魏~晉	紅陶黃薄釉	不明
2	安徽省蕪湖赭山	魏~晉	青釉	不明
3	江西省瑞昌馬頭	西晉前期	青釉	不明
4	不明	吳~晉	青釉	不明
5	不明	西晉太康十年 (289)	青釉	不明
6	不明	吳~晉	青釉	○
7	不明	吳~晉	青釉	不明
8	不明	西晉永康元年 (300)	青釉	不明
9	不明	西晉	青釉	不明
10	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表四 穀倉罐之外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所見佛像

編號	出土地	紀年（西元）	形制、釉色
1	不明	西晉	青瓷豆
2	浙江省紹興九巖窯址	六朝	青瓷坐佛
3	江蘇省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吳墓	吳鳳皇二年 (273)	坐佛
4	浙江省吳興縣西晉墓	西晉元康六年 (296)	青瓷雙耳罐
5	不明	西晉	青瓷奩
6	湖北省宜昌市晉墓	西晉	青瓷博山爐
7	湖北省鄂城	六朝	青瓷佛像洗
8	不明	西晉	青瓷奩
9	浙江省紹興（？）	吳~西晉	佛像浮彫壘（釉已剝落）
10	浙江省紹興（？）	晉	青釉坐佛

編號	(佛像)裝飾部位	出土年	備註
1		1954	殘片(屋頂、花柱、人物、鳥獸等)
2		1954	殘片三件。
3		1972	
4		不明	Eumorfopoulos 氏藏
5		不明	上海藏
6	上部貼塑	不明	日本藏
7		不明	日本正木氏藏
8		不明	
9		不明	日本松岡美術館藏
10		不明	

編號	(佛像)裝飾部位	出土年	備註
1	器身	不明	
2		1937	三件
3		1950 年代	三件
4	肩腹之間	1979	
5	腹部	不明	
6	托口與器體之間飾三尊坐佛	1983	
7	不明	不明	
8	器身	不明	
9	器肩	不明	
10		不明	

表一文獻出處：

1. 曾昭燏編輯，〈鄧府山古殘墓清理記〉，南京博物院編輯《南京附近考古報告》收，南京博物院集刊之1，圖版伍之1~4，1952。
2. 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兼論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學報》1957年4期，圖版貳之4。
3. 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一九五五年南京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李鑑昭、倪振遠、張寄庵），〈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1期，圖版壹之2。
又，該墓出土的穀倉的佛像貼飾，可參見楊泓，〈吳、東晉、南朝的文化及其對海東的影響〉，《考古》1984年6期，圖1左。
4. 《南京博物院展》圖50，1981，東京。
南京博物院，《江蘇六朝青瓷》圖29，文物出版社，1980。
5. 金崎，〈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6期，圖版參之2。
6. 李蔚然，〈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2期，圖版玖之4。
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板橋鎮石閣湖晉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6期，圖版肆之6。
8. 江文，〈江寧縣秣陵公社發現西晉太康四年墓〉，《文物》1973年5期。
9. 繭山康彥，《中國文物見聞》圖112，繭山龍泉堂，1973。
南波，〈江蘇句容西晉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6期，圖5之1。
10. 繭山康彥，前引書，圖113。
11.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肖夢龍），〈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圖3。
《南京博物院展》，前引書，圖52。
《江蘇六朝青瓷》前引書，圖12。
12.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肖夢龍），前引文，圖4。
朱伯謙，《越窯》，圖26，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中國陶瓷全集4，1981。
13. 南波，〈南京西崗西晉墓〉，《文物》1976年3期，圖9。
《江蘇六朝青瓷》，前引書，圖30。
《南京博物院展》，前引書，圖61。
14.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3(1980)，圖版拾伍之1。
《江蘇省六朝青瓷》，前引書，圖16。
15.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前引文，圖版拾伍之2。
《江蘇省六朝青瓷》，前引書，圖13。
朱伯謙，前引書，圖63。
16.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前引文。
17.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四號晉墓〉，《考古》1983年8期，圖版捌之1~4。
18. 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8(1983)，圖版壹之1、2。
19. 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前引文，圖版壹之4。
20.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頁170，文物出版社，1982。

表二文獻出處：

1. 陳萬里，《瓷器與浙江》頁40，1946年初版，1975年神州圖書公司再版。
圖片見小山富士夫，〈古越磁について〉插圖180，《世界陶磁全集》上代篇收，河出書房，1955。
另外，據小山氏（同上文，頁228）言，保（寶）椒塔發現的青瓷飾鳥樓閣明器，一說出自晉元康九年（299）墓，一說是發現於「元康二年曹氏造作」（301）紀年墓。本文則依據發現人陳萬里的報告。
2. 張拯亢，〈紹興出土古物調查記〉，《文瀾學報》3卷2期，1937，圖4。
3. 張拯亢，同上文圖5。
4. 張拯亢，同上文圖6。
5. 岡崎卯一，〈紹興出土の二三の飾壺〉，《寶雲》33，插圖1~5，圖版1、2，1944。
6. 朱伯謙，〈諸暨蠶桑學校工地清理晉墓兩座〉，《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2期，封裡圖版左。
7. 朱伯謙，《越窯》圖36，中國陶瓷全集4，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1。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頁161，文物出版社，1982。
8. 林華東、展汝，〈寧波慈溪發現西晉紀年墓〉圖6，《文物》1980年10期。

9. 朱伯謙，前引書，圖 57。
10. 金華地區文管會等，〈浙江武義陶器廠三國墓〉，《考古》1981 年 4 期，圖 5 左。
11. 衢州市文管會（崔成實），〈浙江衢州市三國墓〉，《文物》1984 年 8 期，圖 6。
12. A.D. Brankst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8~39. Vol. 16.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的遺物と其の遺跡〉，《紀元二千年記念史學論文集》收，頁 1131，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編，1941。
13. 陳萬里，前引書，頁 42。
圖片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盜選集》圖 1，文物出版社，1962；蔣玄怡、秦明之編著，《中國瓷器的發明》（紹興出土古陶瓷研究）圖版 30 右，公私合營藝苑真賞社出版，1956。
14. 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藝術叢編》第二帙，第八冊收，廣倉學窘印行，1927。
15. 《新中國の出土文物》圖 116，（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
朱伯謙，前引書，圖 96。據朱氏（同上書頁 189）該作品係出自永昌元年墓中。
《新中國の出土文物》將其年代訂為「西晉」，朱氏則比對過去紹興出土的吳永安三年同類作品，主張係吳時代物。
16. 馮先銘，〈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從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陶瓷展品談起〉，《文物》1973 年 7 期。
17.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前引書，頁 161。
18. 馮先銘，前引文。
19.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 年 9 期，圖版伍之 5、6。
20.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同上文，圖版陸之 5、6。
21.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同上文。

表三文獻出處：

1. 王步藝，〈蕪湖赭山古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 12 期，頁 46，右上圖。
2. 王步藝，前引文。
3. 江西省博物館（程應林），〈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考古》1974 年 1 期，圖版伍之 1。
4.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s, Illustrated Catalogue (Sotheby & Co. 1940) p.21.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的遺物と其の遺跡〉第 7 圖及註 22，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編《紀元二千六百紀念史學論文集》收，1941。
5. A.D. Brankst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8~39. Vol. 16.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的遺物と其の遺跡〉，《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收，頁 1131~1132，同出處(4)。
6. 小山富士夫，《青磁》圖 1，陶磁大系 36，平凡社，1978。
7. 小山富士夫，同上書，頁 88，插圖 5。
8. 馮先銘，〈記一九六四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文物》1965 年 2 期，頁 37。
9. 《松岡美術館收藏中國陶磁名品展》圖 6，日本經濟新聞社，1983。
10. 蔣玄怡、秦明之編著，《中國瓷器的發明》（紹興出土古陶瓷研究）圖版 29 左，公私合營藝苑真賞社出版，1956。

表四文獻出處：

1. A.D. Brankston, Yueh ware of the "Nine Rocks" Kil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PLATE II. F.
2. A.D. Brankston Ibid., PLATE. II. E.
3. 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南京出土六朝陶俑》圖 3，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
4. 朱伯謙，《越窯》圖 35，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1。
5. 朱伯謙，同上書圖 42。
6. 宜昌市文管處（周之梅），〈宜昌市六朝墓葬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84 年 1 期（總 10 期），圖 2、5。
7. 蔣贊初，〈鄂城六朝考古散記〉，《江漢考古》1983 年 1 期，頁 37。
8. 日本東山健吾教授藏。筆者實見。
9. 蔣玄怡、秦明之編著，《中國瓷器的發明》（紹興出土古陶瓷研究）圖版 26 左，公私合營藝苑真賞社出版，1956。
10. 蔣玄怡、秦明之編著，同上書，圖版 38 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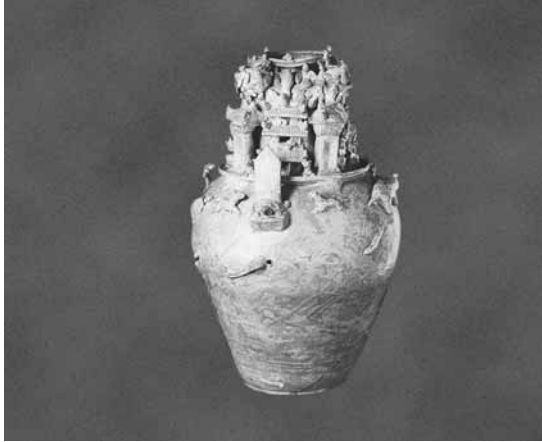


圖1a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永安三年（260）銘
浙江省紹興出土



圖1b 同左局部



圖2a 陶罐穀倉 三國、吳
江蘇省江寧縣出土



圖2b 同左局部



圖3 黑褐釉穀倉罐 三國、吳
南京甘家巷出土



圖4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
浙江省蕭山縣永昌元年墓（232）出土



圖5 青瓷穀倉罐 西晉元康元年（291）銘
浙江省平陽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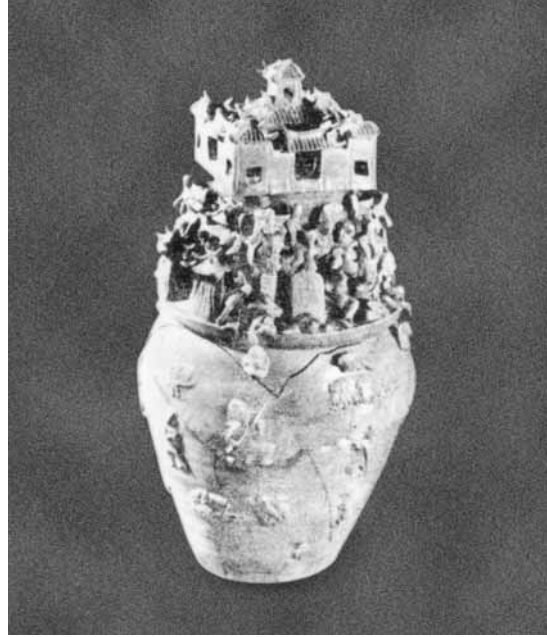


圖6 青瓷穀倉罐 西晉元康二年（292）銘
江蘇省吳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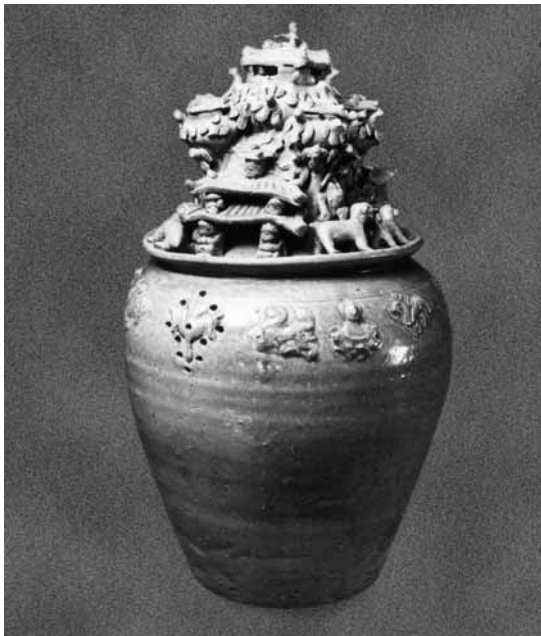


圖7 青瓷穀倉罐 西晉
南京市西崗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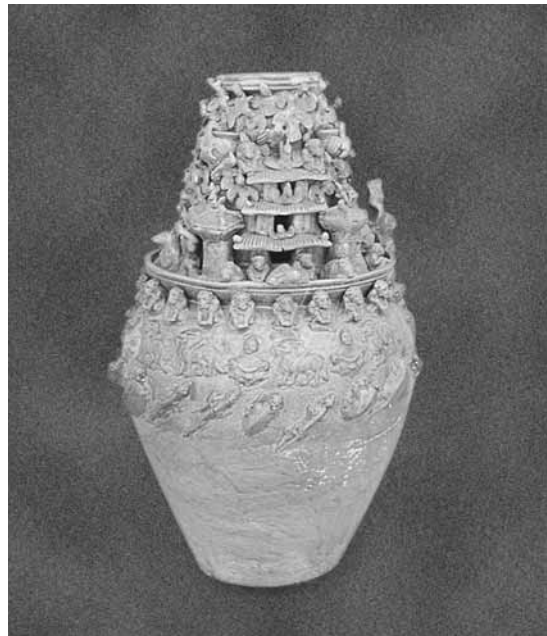


圖8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
江蘇省金壇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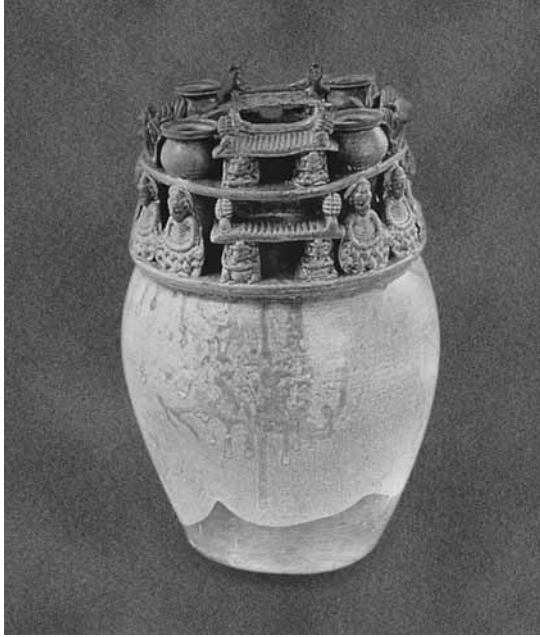


圖9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西晉
日本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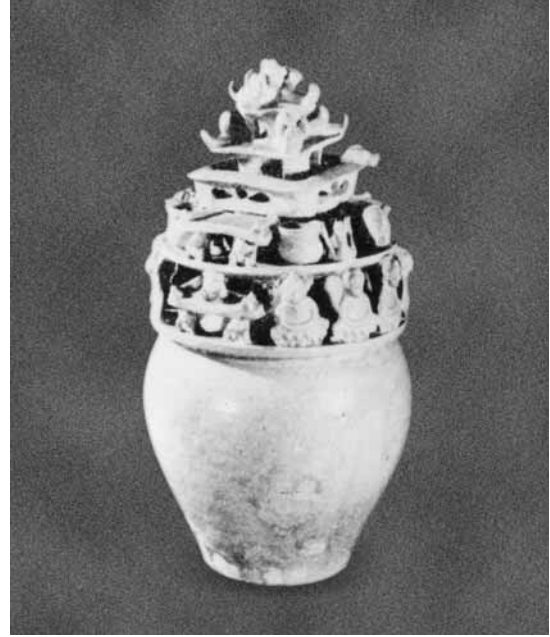


圖10 青瓷穀倉罐 西晉
江蘇省吳縣元康五年（295）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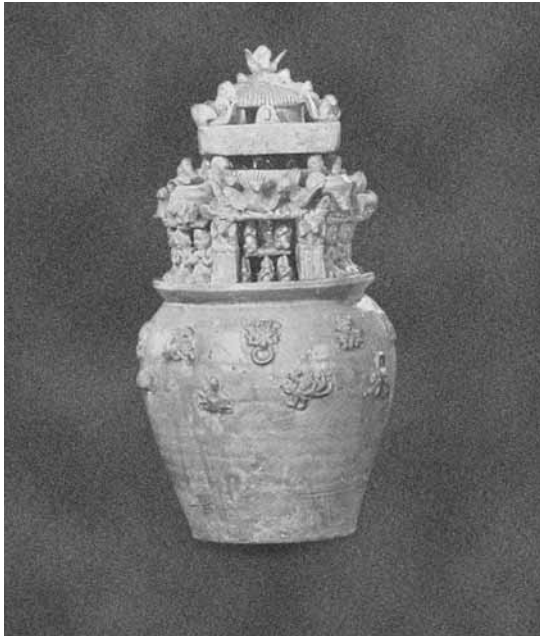


圖11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
南京江寧縣天冊元年（275）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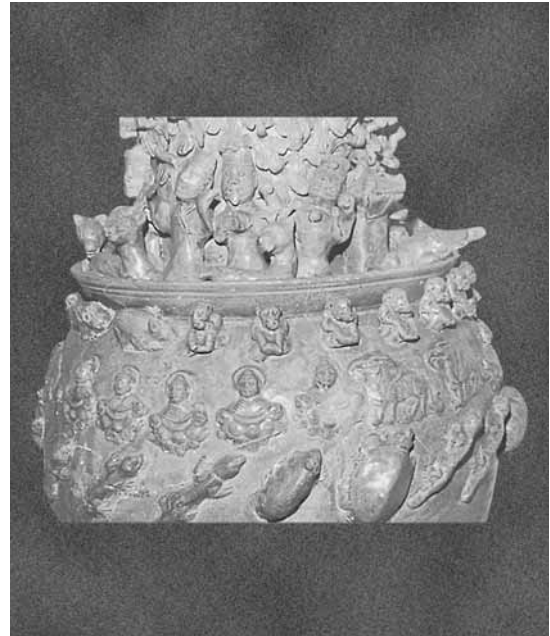


圖12 江蘇省金壇縣出土青瓷穀倉罐（同圖8）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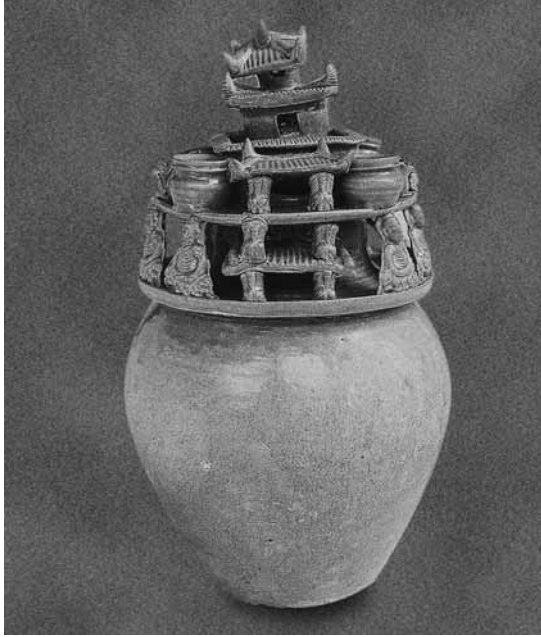


圖13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晚期
浙江省武義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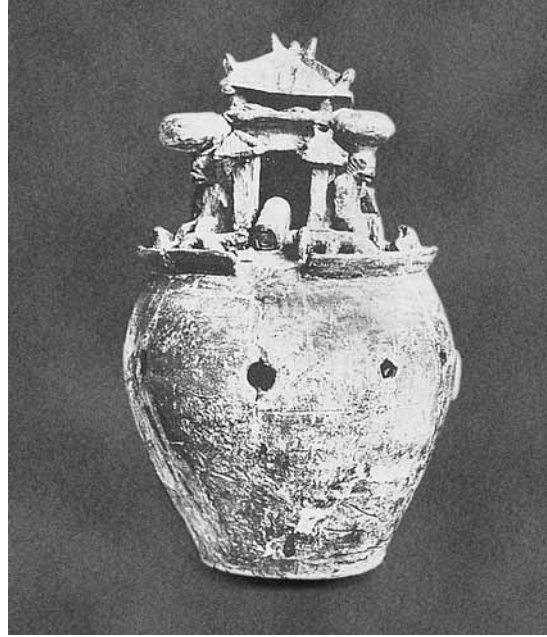


圖14 紅陶穀倉罐 三國吳~西晉
南京鄧府山出土



圖16 青瓷豆 西晉
原浙江杭州楚氏藏



圖17 青黃釉小坐佛 晉
浙江紹興出土(?)



圖15 青瓷小坐佛 六朝
浙江省九巖窯址採集



圖18 三國吳小坐佛
南京趙士崗鳳凰二年(273)墓出土



圖19 青瓷穀倉罐 三國吳
南京趙士崗鳳凰二年(273)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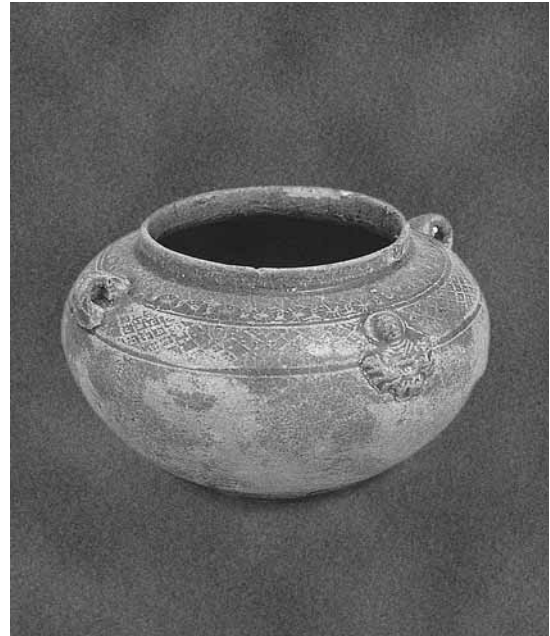


圖20 青瓷貼花佛像雙耳罐 西晉
江蘇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296)墓出土



圖21a 裝飾有佛像的青釉博山式薰爐 西晉
湖北省宜昌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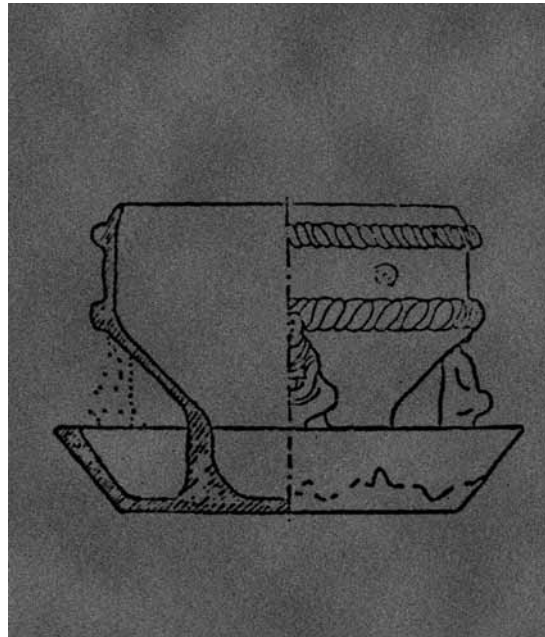


圖21b 同左 線繪圖



圖22 青瓷貼花佛像奩 西晉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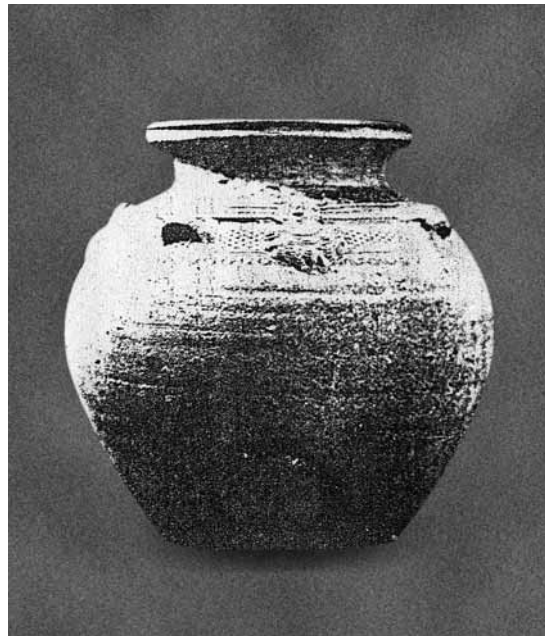


圖23 青瓷貼花佛像帶繫罐（釉已剝落）
三國吳～西晉
浙江省紹興出土（？）